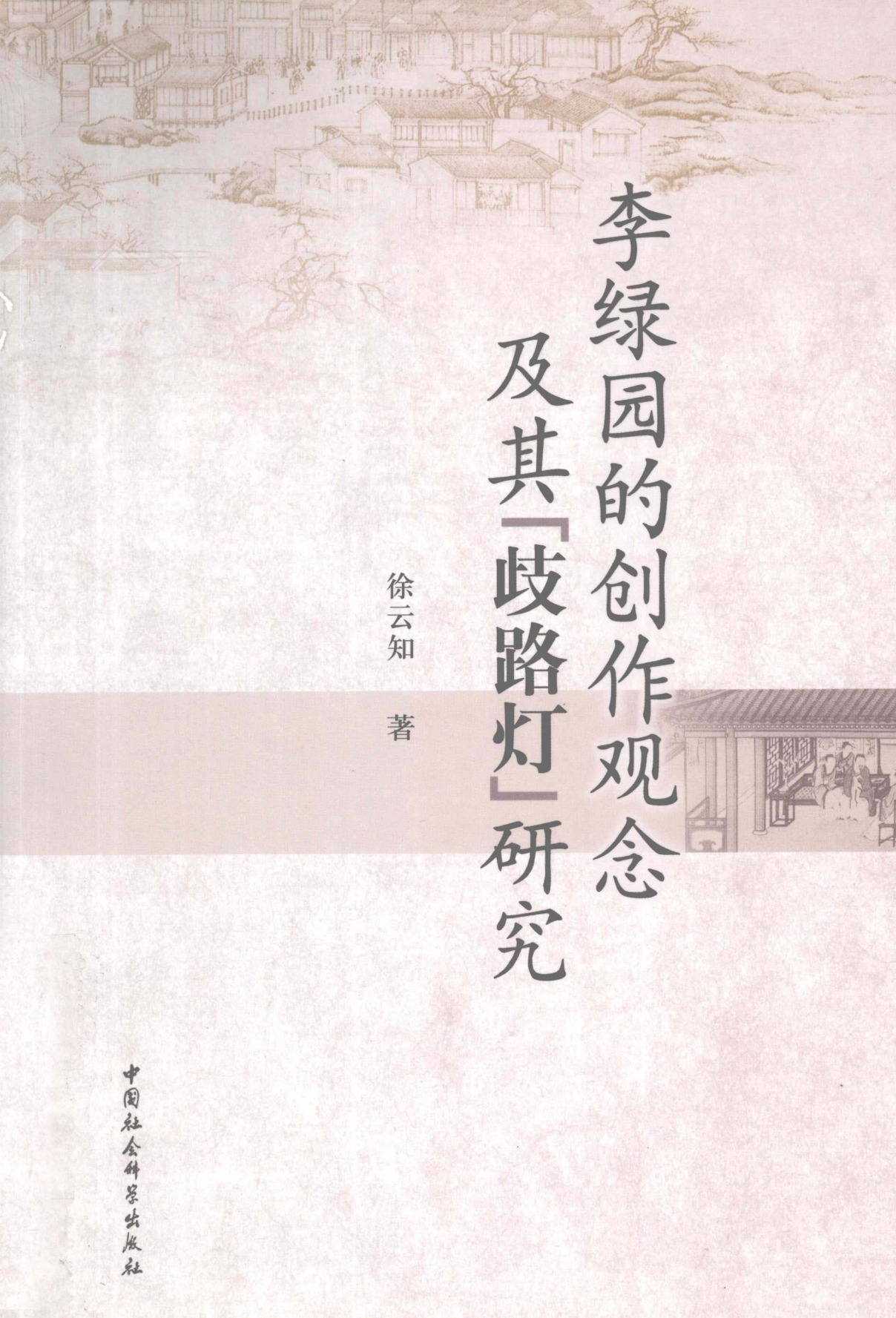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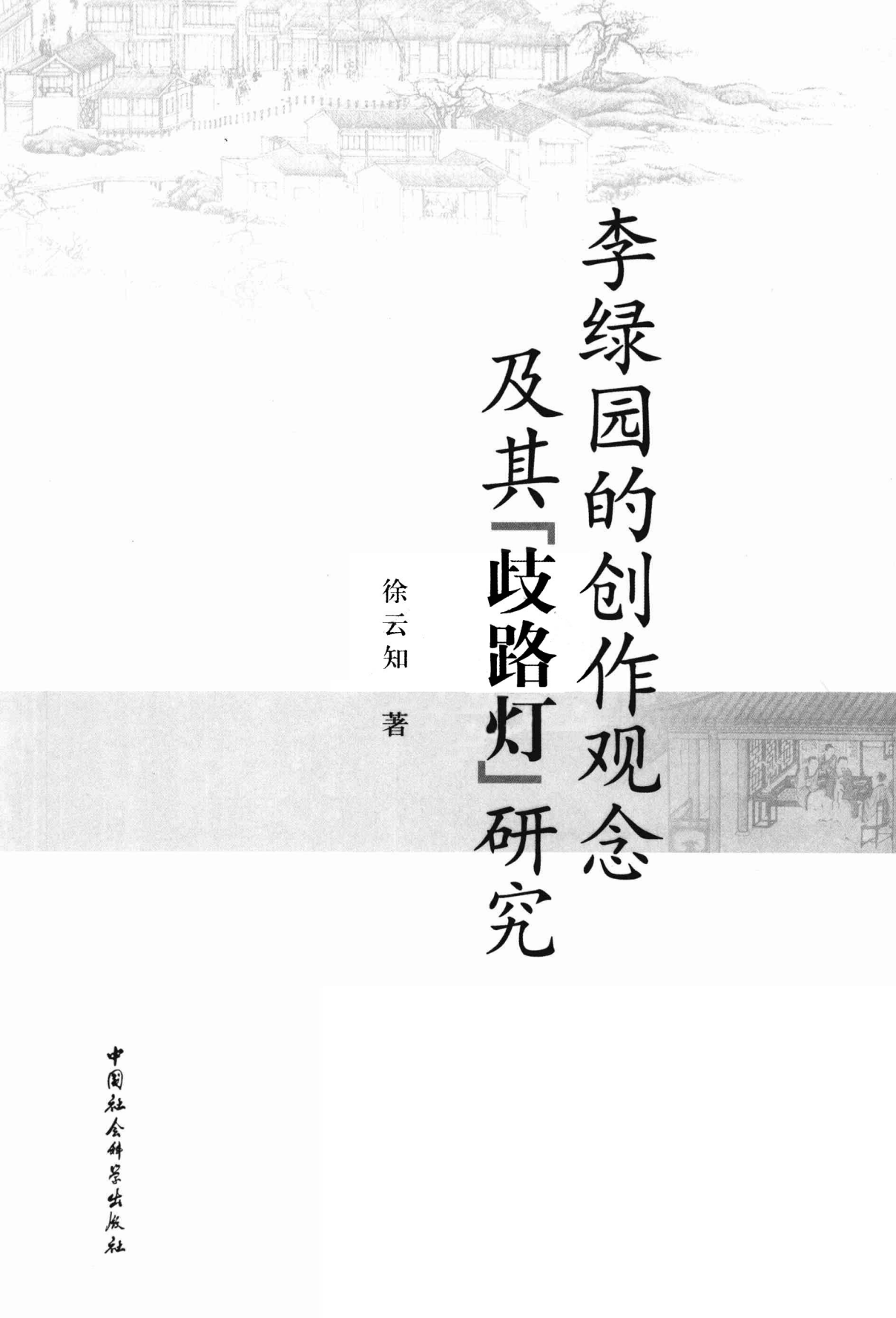




李绿园的创作观念 及其「歧路灯」研究

徐云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绿园的创作观念 及其「歧路灯」研究

徐云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绿园的创作观念及其《歧路灯》研究 / 徐云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04 - 8740 - 1

I. ①李… II. ①徐… III. ①李绿园 (1707—1790) - 教育
思想 - 研究②歧路灯 - 文学研究 IV. ①G40 - 092. 49②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9110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7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摘要

本研究从文学和教育学交叉的视角切入，在研究中强调三次重心转移：从以研究者为中心（第一章 读者论）、到以时代和作家为中心（第二章 时代论），再到以作品为中心（第三章 作品论），最后是本研究的结论部分。研究是沿着从总体一部分—总体的研究思路展开的，第一章（对以往研究进行总结）和结论（对本研究进行总结）虽侧重点不同，但都属于总体研究，第二、三章切入具体研究部分。

从结构上本研究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力求准确、客观地对以往关于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研究进行梳理把握和观照，这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首先，概述近百年来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研究历程及目前的研究状况；其次，从教育小说的概念、教育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教育小说的题材流变入手，给《歧路灯》归类，确定其为教育小说。关于教育小说的概念，前人已有定义，但这种定义并不严格、规范，鉴于此，本研究在教育小说概念的界定上入手，力争这种界定科学规范，使之具有普适性。

第二章：首先把握李绿园的创作观念形成的时代因素，主要从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与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入手，分析经济的发展对当时的文化及社会风气的决定性影响，进而得出结论：康乾盛世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气是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重要因素；然后从李绿园的生平切入，解析时代对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作家又是如何在与时代互动的同时，从其教育家与小说家的社会责任感出发，以其独特的视角来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后以《〈歧路灯〉自序》为依据概述其以小说行教化的创作观念。

第三章：结合李绿园创作实践的成果——《歧路灯》文本，侧重研究其作品的内容，以此透析其以小说行教化的创作观念的本质。主要从李绿园的教育观、教育对策、《歧路灯》的教化内容与形式及其教育影响五个方面来研究李绿园在创作实践中是如何赋予其小说以“教化至上”的实质内容，其小说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以小说行教化的创作观念。

结论：《歧路灯》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白话教育小说。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创作观念的文学意义在于“浪子回头”这一教育题材至《歧路灯》为集大成者，是一次有益的大胆的尝试；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创作观念的教育意义在于：首先他揭示出青少年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必然关系，并意识到教育是一个立体化的影响系统，只有各种影响因素综合起作用，才能实现培养人的目的，而且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要与个体的发展、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

本研究尽可能回避以往研究中已有定论部分，在自身逻辑结构尽可能合理和完整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澄清和解决，在填补中国教育史对中国古代教育小说研究空白的同时，结合中国文学史对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的创作观念进行客观理性的定位、观照与反思。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教育小说和《歧路灯》研究概述	(3)
第一节 教育小说与李绿园的《歧路灯》	(3)
一 教育小说	(3)
二 教育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	(7)
三 教育小说的题材流变	(11)
第二节 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研究概述	(15)
一 《歧路灯》在文学史和教育史上的地位	(15)
二 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研究历程	(17)
第二章 李绿园的创作观念及其成因	(38)
第一节 李绿园创作观念的时代成因	(38)
一 康乾盛世的经济与文化	(39)
二 康乾盛世的社会风气	(52)
第二节 李绿园的家世及其社会角色	(76)
一 李绿园“以孝相踵”的家世	(77)
二 道学家、教师和循吏的角色	(88)
第三节 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的创作观念	(100)
一 李绿园对传统“文”“道”观的继承	(101)
二 对创作主体文行出处的要求	(105)
三 李绿园对小说内容的选择	(106)
四 李绿园对小说形式的要求	(111)
五 李绿园“教化至上”的创作原则	(119)
第三章 李绿园的艺术创作实践	(126)
第一节 《歧路灯》中的教育观	(127)
一 李绿园的哲学基础——人性论	(127)
二 李绿园的教育目的——学为圣人	(132)
三 李绿园的教育观念——富教并重	(137)

第二节 《歧路灯》中的教育对策	(139)
一 用心读书亲近正人	(139)
二 读圣贤书亲近正人	(142)
三 八字家训主题先行	(144)
第三节 《歧路灯》中的教化内容	(146)
一 理学为体、实学为用	(146)
二 吏治观念	(154)
三 妇女教育	(164)
第四节 《歧路灯》中的教育形式	(175)
一 官学	(175)
二 私学	(182)
三 书院	(186)
第五节 《歧路灯》中的教育影响	(189)
一 家庭环境的影响	(189)
二 社会环境的影响	(192)
结语	(211)
附录一 李绿园年谱	(213)
附录二 李绿园交游考	(262)
附录三 李绿园卒地考	(288)
附录四 《歧路灯》版本考	(293)
附录五 《歧路灯》传播问题考辨	(301)
参考文献	(311)
后记	(324)

引 论

一般说来，在人文社科领域里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无不是被人们思考过的，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正是这种“重新思考”使我们的思想显得与前人不同，而使我们的思想显得与前人不同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就知识积累而言，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研究视角的调整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我们对李绿园的创作观念的研究正是基于前人的积累和研究视角的调整变化。

一部文学作品不单要看它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反映生活，还要看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生活；不但看在其内容与形式的背后支撑作家创作的动机和理念，还要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作家的创作理念。不仅如此，还要将作家（还原）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这个大的坐标系之中，看时代对其本人及其作品的影响及其本人与其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了时代的脉动，明确其社会价值何在。一部《歧路灯》反映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富”与“教”的关系问题及“教如何教”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依旧存在，依旧需要解决而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李绿园阐述的许多文学命题与教育命题对于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研究李绿园离不开《歧路灯》，尽管李绿园在当时是以诗名（《国朝中州诗钞》因收录其诗作，《中州艺文录》遂为其立传）而被人们认知，但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却是他的《歧路灯》。一部《歧路灯》总体而言是李绿园赋意、文本传意、读者和批评家释义的复合共同体。本研究先从“教育小说”概念的界定入手，试图对作者赋意的内外影响因素和文本的意义构成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和论证，进而揭示《歧路灯》的意义不单纯是李绿园对文学的理解和诠释问题，也是其教育价值的判断与教育理念的支撑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对《歧路灯》给予格外的关注，并以此透视中国18世纪文学意义与教育意义的构成，以期在人文反思和重构社会文化语境中寻求文学理解与教育理解的具有借鉴价值的普遍性的东西。

李绿园及其《歧路灯》是清代作品，无论是李绿园，还是李绿园所处的时代，无论是作为文本的《歧路灯》，还是《歧路灯》所展示的内容均属

于历史。无论我们想从时代方面，还是从作家方面还原历史，我们都只能无限地接近作家所处的时代和作家本身，时空的距离已经使我们无法再现当时的历史的真实。虽然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本原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变的，但时空距离所造成的主观偏见和误解是显见存在和无法消除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诠释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①。但是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适应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在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同时从中接受正反两方面对于我们今天可以引以为借鉴的东西，并把它们解释成我们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纳入我们的价值体系。历史既是理解的前提，又是理解的产物；理解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被读者理解的文本内容是文本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它远比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多得多。

如果我们以时间为横轴以空间为纵轴做一个坐标系，那么李绿园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坐标系，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另一个已经旋转了的坐标系，两个坐标系之间又有许多个旋转程度不一的坐标系，尽管这些坐标系不同，但这些坐标系拥有一个原点，那就是李绿园及其作品。与李绿园同时代的读者、其后的读者都和我们一样，处于坐标系之中，位置不同，看原点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本身构成了解读文本的审美系统，让我们领略到李绿园及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本研究偏重于以史证文、以文证史和文史互证，力求通过对时代、作家、作品和读者（包括研究者）几个方面的分析，从中勾勒出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创作观念之实质，试图通过该研究对清中叶小说观与教育观有更深刻的理解与阐释。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M]。

第一章 教育小说和《歧路灯》 研究概述

《歧路灯》的主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教育问题，近三十年来关于《歧路灯》的题材定位一直众说纷纭，研究者或以家庭小说命名之，或冠以讽刺小说，或称之为世情小说，或认为它是教育小说、劝诫小说，等等。究竟《歧路灯》当属小说文体中的哪一种题材，本研究从教育小说释名、教育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以及教育小说题材的流变三个方面来探讨《歧路灯》的题材定位问题。

第一节 教育小说与李绿园的《歧路灯》

一 教育小说

教育的日常概念有三类，一类表明教育是一种深刻的思想转变过程，一类是作为方法的教育，还有一类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教育。英语中的“教育”（education）最早起源于拉丁文 educare，意思是采用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就潜藏于人身上的东西引导出来，即将一种潜在的素质转变为现实素质。在我国，“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但这两个字在当时并无一个确定的含义，倒是《礼记·学记篇》中的“建国郡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可以作为“教育”的缘起。

科学概念的“教育”一般从两个方面来定义：

从社会角度可以将教育分为广义的教育和狭义的教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广义的教育；狭义的教育则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更狭义的教育有时单指思想教育。社会角度的定义方式强调的是社会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把教育当做社会的一部分，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

从个体角度定义的教育往往将之等同于个体的学习或发展，有的研究者曾把教育定义为“成功地学习知识、技能与正确态度的过程”，这里的学习内容应是值得学习者为之花费时间与精力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则一般应是学习者能通过所学知识表现自己的个性，并将所学知识灵活地应用到学习时自己从未考虑过的境遇与问题中去。个体角度定义的出发点和基础是学习和学习者，侧重教育过程中个体各种心理需要的满足和心理品质的发展。

由以上两种定义方式可以确认：教育是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的实践活动。所谓个体的社会化，是指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把个体培养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一定态度、知识和技能结构的人；所谓社会的个性化，是指把社会的各种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渗透到需要、兴趣和素质各不相同的个体身上，从而形成他们独特的个性心理结构。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是教育这一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前提、密不可分。这种定义方式在描述了教育的活动性同时指出教育是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的耦合过程，强调了教育在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促进或加速作用，并强调教育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强调教育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之间的联系，从而说明教育活动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特征。构成教育的基本要素有三个，即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影响，三者缺一不可。

“小说”二字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大达”即大道，指博大精深的学说，“小说”则指无关大道的观点和言论，这里的“小说”只是组合成词，不具有文体意义。《汉书·艺文志》中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可以看做是“小说”的缘起。但《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评价并不高：“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可见小说被摒弃于“可观者九家”之外，是与“通万方之略”不相干的东西。

“小说”中的“小”字，一方面说明它在文化品位上属于“小道”；另一方面说明它在文体形式上的表现形态是“残丛小语”，汉桓谭《新论》中

有“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小说”中的“说”字，有三层意思：一为文体形态层面的“说故事”或“叙事”（见《韩非子·说林》、《韩非子·储说》）；二为表现形态层面的“解说”，汉许慎《说文解字》有“说，释也”；三为功能形态，有“喜悦”、“娱乐”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释，即悦恠。说，悦；释，恠；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恠二字。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①。

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有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唐代，一次是明代。在唐代，小说的构成形态出现了文人的诗心灵性与多重文化和多种文体因素的融合，所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语）即指这种文体构成形态融合的自觉程度和成功程度，唐代小说已“文备众体”；在唐宋两代出现了书面文学和民间口传文学方向相反的融合与离析，以唐传奇为标志的书面文学与文人文化的融合，提高了小说的审美档次，以宋元说话为标志的民间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碰撞而离析，拓展了小说发展的前景。因此胡应麟《少室山房笔记·九流绪论》说：“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明代以降，文人参与小说创作，以“四大奇书”和“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第二次融合直接指向雅文化和俗文化层面，使民间文学、文人文学和外来宗教文学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近代，小说的教化功能被提到一定高度，有矫枉过正之嫌。有例为证：一是鸦片战争后，个别冬烘文人主张将“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的《红楼梦》等“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用毒如鸦片的“淫书”到英国去“海淫”，目的是“使其人淫、使其国亡”^②；二是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官绅的应急措施是赶印《荡寇志》，虽然目的是“以自劝惩”，但“厥后渐臻治安”被认为是“是书之力也”^③，也就是说《荡寇志》不但保住了城池，而且还平息了匪乱；三是戊戌变法人士如梁启超在维新受挫、救国无路、救民乏术的困境中发现外国的政治小说在富国强民中积极的先导与催化作用，因此认为“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④。且不论上述三例的可行性，仅此可见小说功能被重视的程度。因此严复、夏曾佑指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凡出

① 杨义·杨义文存（卷六，《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5.

② （清）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A]·民国十六年（1927）影印本.

③ （清）钱湘·续刻《荡寇志》序·清同治七年刻本.

④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J]·新小说.1902（1）.

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①，即明确提出要注重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

小说，作为文学的一大类别，作为叙事性文学体裁之一，其成熟的标志应包括三个要素：就表现形式而言，其主体应为散文，但并不排除用一定的韵文写景、状物与议论；就其内容而言，它要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从而与文学散文有明显的区别；就构成其故事情节的性质而言，它应当是虚构的，或基本上是虚构的；此外，文学语言的自足性也是小说的一个特征。作为小说，一般具有教化、娱乐和审美的功用，而它的功用以它的故事性、通俗性为前提^②。

“教育小说”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德语 *Bildungsroman* 一词，又可称为“成长小说”或“性格发展小说”，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以及凯勒的《绿衣亨利》均被认为是教育小说的典范之作，从这三部作品的内容不难发现，所谓的“教育小说”均与一个人的成长（或性格形成时期的生活）历程相关，“追溯一个年轻人的成熟历程：自反叛到认同社会规范”，具有“某种教寓和惩戒性质”^③。茨维坦·托多洛夫的《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小说，它只是沿用了“教育小说”的传统内涵来叙述托多洛夫本人是怎样从一个保加利亚“文学理论家”转变成“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又转变成“对话批评的提倡者”这样一个思想变化、成长过程^④。

在中国“教育小说”古已有之，但对此概念尚无准确的界定。1904年创刊的《新新小说》和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都使用过这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有研究者给“教育小说”下定义，认为教育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题材分类”；“它是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等组成的小说的艺术形式形象化地反映培养儿童、青少年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教育活动的小说类型”^⑤。对这个定义，笔者认为：

其一，教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题材分类”。“教育小说”，顾名思义，“教育”界定的是题材，是内容；“小说”框定的是体裁，是形式；离开了

①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J]，国闻报，1897。

② 马振方：《小说艺术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11。

③ （台湾）大美百科全书（第二十卷）[Z]，光复书局，1991，375。

④ [法国]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2。

⑤ 李延年：《歧路灯》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3。

“教育”题材（内容）的小说不是“教育小说”，同样，离开了“小说”体裁（形式）的教育题材也不是“教育小说”，作为“教育小说”要同时兼有教育和小说的基本要素和一般特征方能称之为“教育小说”。

其二，对教育小说要有明确的时空范畴界定。对“教育小说”在时段范畴的界定上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古代”，因为中国现、当代也有教育小说；何况“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小说并不多见。另外，教育小说在空间范畴的界定上也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外国也有教育小说，法国卢梭的《爱弥尔》、瑞士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等都是教育小说。一般说来，对于一个概念定义的外延的界定要有普遍适用性，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对“教育小说”的定义。

其三，概念外延界限要明确。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不是可以并列的概念，它们之间在科学意义上的范畴关系应该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从属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社会教育这个大概概念之内的两个类属概念。广义的教育就是社会教育，它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狭义的教育指学校教育，将社会教育看做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教育是不确切的。日常约定俗成的社会教育仅仅是从空间的范畴来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教育统称为社会教育。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教育小说是叙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教育（含师生关系）环境影响下的发展及成长过程的小说，它具有某种教育和惩戒性质。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小说的定义。此外，教育小说作为小说题材的一种，须具“教育”和“小说”的全部要素和功能。

《歧路灯》由于具备教育和小说的诸要素，且是教育题材与小说体裁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因此可以确定它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教育小说。

换一个角度论，如果说《歧路灯》就是这样一部教育小说的话，那么我们对时代、作家、文本及以往读者、研究者的解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时空距离意义上的新的对话形式，这种解读已经具有新的诠释意义。由于每个人对它们的诠释都存在个体差异性，而展示自己解读的心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小说。

二 教育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

从教育小说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确认《歧路灯》为教育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这一结论，事实上，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

究视角出发,对于《歧路灯》的题材有不同的定位。我们想确认《歧路灯》为教育小说,还要廓清它与其他小说之间的区别。

关于小说分类宋代已始,说话之家数即是,如《都城纪事》、《梦粱录》等均有,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又把明清小说归纳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明之拟宋市人小说、清之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公案小说及谴责小说,等等。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歧路灯》始终未置一词。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歧路灯》是世情小说^①。世情小说的定义最早见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很大程度上概括出了世情小说重在“绘世”的实质。而“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因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明代的世情书是《金瓶梅》,清代则非《红楼梦》莫属。“‘世情书’的传统,到《红楼梦》并没有完结。之后的《歧路灯》和《蜃楼志》,是清中叶章回小说的佼佼者。它们与《红楼梦》一道将世情小说创作推向了高潮。”^②有时也称世情小说为人情小说。其实世情小说与人情小说不过是一物二名,并无实质性的差异。认为《歧路灯》是世情书的研究者认为:“《歧路灯》的故事假托明代,描写的实际是清中叶的现实生活。作品围绕谭家的兴衰和谭绍闻的沉浮,真实地反映了中等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赌场之类社会阴暗角落的描写,十分详尽,是以往小说中所少见的。小说中的人物,共有二百多个,三教九流,各种各样,有行为古板的道学家,庸庸碌碌的读书人,忠心耿耿的仆人,为非作歹的官吏,也有行为放荡的纨绔子弟,狡猾刁钻的地痞无赖等。

① 持此观点者有:张稔穰.古代小说艺术教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66.向楷.见《世情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97—303.

② 沈治均.中国古代小说简史.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371—379.
蔡国梁.世情小说之一派:《歧路灯》漫评[J].河北大学学报.1985(1).

通过他们的活动，作品展示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中下层社会的风俗画卷。”^①

把《歧路灯》归为家庭小说的研究者认为：“《歧路灯》借鉴和继承了《金瓶梅》的结构形式，它也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由记载一家的盛衰而扩及当时整个社会”^②，它是“以封建社会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③。一部一百零八回的《歧路灯》，前十二回写谭绍闻的父亲谭孝移从直觉中意识到教子的重要性、迫切性与严重性，从十三回到八十二回写谭绍闻失怙后一步步堕落的过程及其间出现的反复，八十三回至末尾主要写谭绍闻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之后，在父执的教育、义仆的规劝、族兄的引导下，终于迷途知返，重新做人。而谭府的兴衰无不与谭绍闻本人直接发生关系。

至于讽刺小说，正如鲁迅所言：“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犹在士林，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④有的研究者也认为：“《儒林外史》有意‘出相’八股先生和孔孟心传之徒，却只见零碎衣饭，不见他们的真相；因为作者既是外道，用攻击的眼光，牢骚的心情去观察去表现，当然不能演出他们的精魂。倒不如《歧路灯》这正人正书，要拿八股先生孔孟心传之徒做青年榜样的；无意攻击，却是深刻地攻击了！无意出相，却是活现地出相了！象娄潜斋、孔耘轩、程嵩淑、谭孝移都是《儒林外史》里时时露面的脚色，却在《歧路灯》里活现着。《歧路灯》第二回在娄潜斋家画着他们的乌托邦；在那时七岁小孩都是十足的儒者！因为李绿园也是这样的人，要抒写自己的理想，要表现自己；反过来，倒活现的替《儒林外史》出相了。”^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歧路灯》当属讽刺小说。

有的研究者把《歧路灯》当做教育小说，“只因其主题集中于教育浪子回头，提出封建社会教育子弟的重要命题，故将其另列为一类——教育小说。教育小说的出现，表明社会小说的多向拓展在清朝中期已蔚成风气”^⑥。

还有的研究者以道德小说命名之：因为“其于道德可谓内外兼到：于

① 沈治均：《中国古代小说简史》[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373.

② 孙菊园：《略论〈歧路灯〉的艺术成就》[A]，明清小说研究（2）[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18.

③ 王先儒、周伟民：《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M]，花城出版社，1988. 542.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55.

⑤ 徐玉诺：《墙角消夏琐记（其一）》[J]，明天，1929（2）（8）（8月14日）.

⑥ 游友基：《中国社会小说通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162—163.

内则中明人性二元，内心中高下善恶争斗（所谓理欲消长）之义；于外则于遗传教育环境诱惑各端，无不描写精详，分析入微。更以其母其妻其师其仆其友其伴各色人物，用为陪衬，一一穿插其间，对于谭绍闻各有其积极消极引上引下之影响，而处处合乎情理。故吾人断定《歧路灯》为能写出道德与人生之真确关系者，实为有价值之小说也”^①。何况“文学不以提倡道德为目的，而其描写则不能离乎道德。文学表现人生，欲得其全体之真相，则不得不区别人物品性之高下，显明行为善恶之因果关系，及对己对人之影响。其裨益道德在根本而不在枝节；其感化读者，凭描写而不事劝说。”^②

究竟《歧路灯》是世情小说，还是家庭小说？是讽刺小说，还是教育小说，抑或是道德小说？

上述的每一种题材定位都有其合理的一面，譬如《歧路灯》用很大的篇幅绘世，且绘得惟妙惟肖；它由一人沉浮而波及整个家庭的兴衰并由此可透析整个世风；而且《歧路灯》在绘世过程中亦讽刺某些假道学、贪官污吏和纨绔子弟等；甚至在《歧路灯》中通篇都充满了道德说教；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每一种定位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歧路灯》描摹世态、写一家兴衰、讽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些都是作为主人公生活和转变的背景因素，都是为塑造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服务的，绝非《歧路灯》的主旨所在。

《歧路灯》主旨重在“教化”：它通过谭绍闻这样一个中下层富家子弟“浪子回头”的经历，表现出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诸如家庭的影响、教师的更换、交友的失误、父执的劝诫、族兄的提携、家境的困窘等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教育的基本环境而存在，它们是谭绍闻堕落与回头的外因；而谭绍闻真正转变的内因是其良知的觉醒和对各种不良诱因的自觉抵制及其对未来生活理想的主动追求。它通过教育环境、教师、教育内容及教育影响等多因素的互动描写来呼吁康乾盛世的统治者应富教并重，每个有责任心的家长应关注孩子的成长，强调教育的缺失对家庭、对社会、乃至对国家的影响。从《歧路灯》的主旨论，它应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小说。

① 佚名·评《歧路灯》[A]·栾星·《歧路灯》论丛（之二）[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269.

② 同上书，266.